第一章　战争胜利生命线

第一节　四战之地　晋冀鲁豫

1937 年 7 月 7日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向驻守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(今为北京市丰台区)的国民党部队 29 军发动进攻,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。8 月上旬，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。8 月 25 日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布命令，任命朱德同志为第八路军总指挥，彭德怀同志为副总指挥，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，左权同志为副参谋长，任弼时同志为政治部主任，邓小平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。将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团、15 军团及 74 师合编为陆军第 115 师(兵员 14000 人),林彪为师长，聂荣臻为副师长（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的编制，对内仍为师政治委员),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 第 2 方面军、27 军、28 军、独立第 1 师、第 2 师合编为陆军第 120 师(兵员 6000 人),贺龙为师长,肖克为副师长,关向应为政治部主任(对内为师政治委员)第 4 方面军、29 军、30 军等部改编为陆军第 129 师(兵员 8000 人)，刘伯承为师长，徐向前为副师长，张浩为政治部主任（对内为师政治委员）；陕甘宁边区 4 个独立团和警卫部队改编为留守兵团(3000 人),肖劲光为司令员。1937 年 9 月 6 日,八路军总部机关由朱德、彭德怀、任弼时、左权、邓小平率领,从陕西三原云阳镇出发，23 日到达了五台县，对日作战。

根据当时形势，毛泽东同志指示：我军在山西，集中于五台山一区难以立足,应分为晋西北、晋东北、晋西南、晋东南,这样互为犄角，密切协同，在日军压力面前才能站得稳，顶得住。此时，115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师主力正转战晋东北向晋察冀边区展开；120 师主力正由雁门关一线向晋西北和晋绥（远）边界发展；129 师主力正鏖战于娘子关一线，已跨过正太铁路向晋东南挺进；晋西南当时不算战区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拒绝我军主力进驻，为作适当之部署，邓小平同志率领傅钟、陆定一、黄镇等总政宣传部、民运部的一些同志和韦国清同志带领随营学校的 3 个队共 500 多人，向晋西南汾阳、孝义一带开进，邓小平同志担任第二战区“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”（简称动委会）的八路军代表，从组织动委会入手，发动群众，开展游击战争。动委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、拥有武装的、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。邓小平同志在晋西南经过数月艰苦细致、雷厉风行、成效卓著的工作，奠定了基础。

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，于延安城南 90 公里的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除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外，扩大到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，共 20 余人。讨论通过了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》和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，确定了战略方针，这就是‘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，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。”

1937 年 9 月 25 日，115 师 343 旅部队于平型关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第 21 旅团 1000 余人，毁汽车 100 余辆，大车 200 余辆，缴获九二式步兵炮 1 门，机枪 20 余挺，步枪 1000 余支。这是日寇侵华以来，第一次遭受沉重打击。10 月 19 日夜，在忻口会战最紧张的时候，我军 129 师由陈锡联任团长的 769 团，经过侦察，在阳明堡发现了敌人飞机场，派出一个营，采取神速秘密奇袭手段，将日军 24 架飞机全部摧毁，歼灭日军 100 余人。平型关和阳明堡两次大捷，全国振奋，各界人士给我党我军发来大量贺电、贺信，甚至连蒋介石也来电祝贺。这两次大胜利，打破了日本‘皇军’不可战胜的神话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和胜利信心，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。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信赖的，这对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，奠定了深厚的基础。

1938 年 1 月 18 日,邓小平同志接替了张浩同志任 129 师政治委员，到达师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。紧接着就和刘伯承师长、徐向前副师长一起研究作战部署，亲自组织了长生口、神头岭、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,3 月 16 日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地区伏击歼灭日军 1500 余人。31 日响堂铺伏击战是邓小平同志和徐向前同志亲临前线指挥的。响堂铺位于涉县——东阳关之间,邯(郸)长(治)临(汾)公路的中间,是日军一条重要的交通线。该地是比较理想的伏击点。3 月 31 日,日军第 14 师团辎重部队两个汽车中队 180 多辆汽车，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开来，我伏击部队三个团,犹如猛虎出山奋勇拼杀,用手榴弹、刺刀消灭了顽抗之敌,激战两个多小时，战斗胜利结束，计毙伤敌 400 余人,180 辆汽车全部烧毁,缴获步枪 300 多支、轻机枪 10 多挺、迫击炮 4 门、弹药甚多。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增援之敌，均被我军击退。

1938 年春天，太行山区抗日战争风起云涌。广大军民在八路军总部和 129 师的直接指挥下，取得了长生口、神头岭、响堂铺战斗的节节胜利。日寇恼羞成怒,4 月初,日军以 108 师团为主力,纠集了 3 万多人的兵力,从同蒲铁路上的榆次、太谷、洪洞,平汉铁路线上的邢台，正太铁路上的平定，邯长大道上的涉县、长治和临屯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九路向晋、冀、豫根据地疯狂进攻,采用‘分进合击’战法,企图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、榆社、武乡地区。为了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大扫荡，八路军总部制定了以一部兵力钳制多路敌人，集中主力击破一路的作战方针。为了打好这一仗，邓小平和刘伯承、徐向前同志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，具体部署反围攻的作战计划和政治动员工作。动员人民群众实行空舍清野。 4 月 10 日，入侵根据地的日本侵略军大肆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遭到我军和游击队的袭扰，加上彻底的空舍清野，日军很快陷入饥渴、恐慌之中。15 日,侵入武乡的日军 3000 余人沿浊漳河东窜，我军 129 师两路纵队于 16 日晨在长乐村地区追上敌人，随即发起猛烈进攻,将敌人分割围歼,共歼敌 2200 余名。到 4 月下旬彻底粉碎了日

军的九路围攻，将敌人全部赶出了晋东南，共歼敌 4000 余人，收复县城 18 座，保卫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，且为我军挺进冀南、豫北创造了有利条件，此役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疾袭战斗，奠定了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基础。4 月下旬，徐向前副师长率领 3 个团挺进冀南，386 旅由陈赓旅长率领向豫北发展，实现了党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战略。1938 年 12 月，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又亲自到达冀南，一面指挥部队作战，一面组织进行地方党和政权建设，发动群众减租减息；召开了冀南军政干部会议，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，依靠群众，依靠农村，巩固冀南和鲁西北地区。直至此时，四战之地——晋冀鲁豫的战局形成。
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，晋冀鲁豫战区包括太行、太岳、冀南、冀鲁豫(由晋豫和鲁西合并形成)四个军区。晋冀鲁豫战区所以成为‘四战’之地，不仅地域上有 4 个省，而主要是由于其战略地位形成，它东连华东，南近中原，北靠晋察冀和冀热辽，西保陕甘宁和晋绥。我军不仅要与日军作战，而且要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。所以，邓小平同志说，在抗日战争时，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。……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，几个大解放区都有，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。

邓小平同志除担任 129 师政治委员的工作外，1942 年 9 月，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，领导太行冀南、太岳、晋豫四个区党委。1943 年 10 月，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，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。1945 年 6 月，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，参加了中共七届一中全会。

第二节　百团大战破击正太路

1940 年，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。国际上德、意法西斯疯狂进攻席卷欧洲大陆，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对国民党施加压力，扬言要兵分三路，从宜昌、洛阳和滇越铁路向蒋介石政府大后方昆

明、重庆、西安发动进攻。汉奸投降派汪精卫之流又大肆劝降，使蒋介石一伙更加动摇，投降危险日趋严重。1940 年 2 月，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，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大肆制造谣言迷惑群众，污蔑“八路军游而不击”“专打友军、不打日军”，挑拨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。同时，国民党反动派推行“曲线救国”，指使他们的一些将领率其所部投降日寇，与日、汪合流，在日伪军支持下进攻八路军。

1940年春天，聂荣臻同志由晋察冀边区到达晋东南，彭德怀、左权、刘伯承、邓小平诸同志与他进行了酝酿，研究破袭正太铁路的问题。在议论中曾研究了把正太路彻底摧毁，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。经过分析，认为要想完全控制正太铁路，或者把它彻底摧毁，恐怕难以实现。因为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它的后方，必须保持它的交通命脉，把山东、河北、山西三个地区紧紧连在一起。当时平绥铁路到同蒲铁路还不通车，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（即现在德石线）还没修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敌人把正太铁路作为它在山西、河北占领军补给保障的命脉，它是绝不会放弃的。因此，完全控制绝不可能。即使我们将其严重破坏，按照敌人的条件，也会很快修复，彻底摧毁也难以实现。但是，对正太路大规模的破击，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是必要的，又是完全能够做到的。

守备正太路沿线的日本侵略军，东段井陉到石家庄是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；西段娘子关到寿阳一带是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；太原、榆次地区是日军独立第九混成旅团。敌人在沿铁路线的各个据点，都构筑了坚固的堡垒群，各碉堡之间又有交通壕相连，周围设有铁丝网、外壕等障碍物，并且构成严密的火力网，确实是易守难攻。

对正太路的大破击，我军进行了三个月的准备。各部队都抓紧时间进行攻坚和破路的训练，派出小部队侦察敌人布防和火力配备，各据点地形，我军做了进攻道路、爆破器材准备、粮秣贮存、群众动员等各项工作，这是保证破击战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百团大战是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组织指挥的（当时朱德总司令已回延安）。7 月 22 日,彭总签发了《战役预备命令》，规定战役目的是“: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,消灭部分敌人,较长时间截断该线交通。并乘胜拔除该铁路南北地区若干据点，展开沿线两侧的工作。”命令确定 129 师和晋察冀军区各以主力一部完成对正太路的破击任务。129 师 8个团在西线、晋察冀军区 10 个团在东段，以阳泉为两区作战分界线；两区作战任务完成后，分别转入正太路两侧地区，对日寇从该铁路线深入根据地的交通线继续破击，扩大战果。120 师 4 个团破击太原以北至雁门关北；在上述作战期间,129 师还要组织力量对平汉、德石、同蒲、白晋(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）敌军交通线展开连续破击，牵制敌人，配合作战。在战斗开始之后，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，自动参加了战斗，奋勇追歼敌伪军，连同原布置的 22 个团,共有 105 个团参战。

按照总部的规定，正太路破击战于 8 月 20 日 20 时开始,各参战部队以隐蔽、迅猛的动作，对敌伪据点发起了猛烈进攻。由于经过周密调查、摸清了敌情、地形,各项准备工作充分,集中了 10 倍于敌的优势兵力，战役进展顺利。经一昼夜激战，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,正太路西段全被控制。与此同时,正太路东段,晋察冀军区部队经三小时激战，攻克娘子关要隘和井陉煤矿。同蒲路铁阳曲至大同段(由 120 师 4 个团破击)、汾离公路全线,以及平汉、德石、北宁铁路和其它主要公路均被切断。正太路上的作战部队、参战民兵和广大群众,在‘ 不留一根钢轨、不留一根枕木、不留一座桥梁 ’的战斗口号下，不顾敌机低空扫射，加紧破毁铁路隧道、焚烧枕木桥梁、平路基、割电线、破坏各项设施。自 8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,胜利完成战役第一阶段各项战斗任务，给予日寇以致命打击，使正太铁路陷于瘫痪,平汉、同蒲、德石、白晋、北宁铁路均被切断。

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，129 师主力部队主要任务是拔除敌人从正太路伸入根据地腹心的榆(社)辽(县)公路沿线的敌伪军据

点,破坏公路,相机收复和顺、辽县两县城,并准备在辽、榆、武(乡)地区,歼灭由白晋路来援之敌,其它部队仍继续对同蒲、平汉、德石等铁路进行破击。晋察冀军区的任务是破击涞源、灵丘境内的公路,夺取这两座县城。为配合“涞灵战役”的作战,冀中军区组织了任(邱)河(间)大(城)肃(宁)战役,各地区还发动了一系列对铁路、公路的破击战。第二阶段自 9 月 20 日开始,至 10 月 10 日结束,攻占了榆社、涞源,歼灭日伪军 3000 余名,缴获甚多。

一个半月接连不断对各条铁路、公路的破击战,使华北日本侵略军极为震惊,陷入十分混乱状态,伪军也纷纷动摇。敌人为挽救危局,暂时放弃了对正面战场国民党的进攻,集中日军主力,对我军进行疯狂的报复大“扫荡”。于是“扫荡”与反“扫荡”的斗争,便构成了战役的第三阶段。日军的“扫荡”,首先从晋东南开始,129 师在敌人强大的进攻下处境十分艰难,在至为关键的关家垴战斗中,战况极为惨烈。10 月 29 日,陈赓指挥 386 旅以及决死纵队一部对关家垴之敌实施总攻击,从早晨 4 时至中午,战斗一直在激烈进行,敌机狂轰滥炸,企图掩护日军突围,我军伤亡不断增多,有的连队仅剩下 10 多个人。陈赓向刘邓首长报告战斗进展及伤亡情况,刘司令员回答他:“……同志,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,难道我不心疼吗!”邓政委接过话筒,十分严肃地对他说:“同志!全局!全局!要从全局出发,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!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,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,一鼓作气,减少伤亡”。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,特别是“全局!全局!”这几个字重于泰山。陈赓表示坚决服从,毫不犹豫地打下去。关家垴战斗共歼灭日军 1000 余人,日军在死人堆里抱头痛哭。这一仗之后有一种说法,说陈赓对谁都不怕,就怕邓小平。实际上,不仅是陈赓,就是整个晋冀鲁豫军区,以至第二野战军,对邓小平政委都非常尊重,这不是个人崇拜,而是对革命权威和铁的纪律的信服。至 12 月 5 日,反“扫荡”作战胜利结束。

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,各战区共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 1800 多次,毙伤日伪军 2.5 万余人,俘虏日军 281 人、伪军 1.8 万余人,共

4.6万余人。拔除敌人大小据点 2900多个,一度收复县城 26个,缴获各种炮 53门,步马枪 5000余支,轻重机枪 200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、军用物资,破坏铁路 900多公里,公路 300多公里,桥梁、隧道、车站等 260多处,使正太路、平汉路中断一个月之久,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极沉重打击。1940年10月15日,敌华北方面军向日本陆军省提出的报告说:“正太路破坏极为严重,规模之大无法形容,敌人(系指八路军)采用爆炸、焚烧、破坏等方法,企图对桥梁、轨道、通信网、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设备,予以彻底摧毁。在进行破坏时,隐蔽伪装得极为巧妙。”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记录记载说:“此次袭击,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,损失甚大,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。”日本防卫厅编写的《华北治安战》一书提到百团大战时承认:“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,突然发动的‘百团大战’,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。因而促使方面军,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。”“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。”日本侵略者华北方面军对此役名之曰“挖心战”,以后每年此日作为‘挖心战’纪念日。

百团大战的重大意义,首先是打破了敌人的‘囚笼政策’,钳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,拖住了它进攻正面战场的后腿,遏止了当时妥协投降的逆流。这样一个在我国抗战史上空前大规模的进攻战役,使全国军民无不感到欢欣鼓舞,大后方许多报纸都发表了庆祝这一巨大胜利的社论和报导,各地群众纷纷来信来电,表示钦敬和慰问。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振奋,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。其次是在对日大规模进攻作战中,使我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,不仅经受了连续作战的考验,而且取得了攻据点、破铁路等战术技术经验,为我军今后经受更严重的考验奠定了基础。

1941年4月,邓小平政委在《反对麻木,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》一文中说:“百团大战给了晋冀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,也给了一二九师以最大的考验。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、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,都有了相当基础,足以

使敌伪胆寒，足以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。但百团大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一些弱点，使得我们在百团大战之后，虽在主力兵团方面得到一些补充与休整，但在根据地的巩固上，则甚为严重。这表现在敌占区日益扩大，抗战区日益缩小”。

1943 年，在总结抗战 5 年来的斗争时，邓小平同志又指出，“百团大战”给予敌人以很大震荡，使敌人重新考虑了问题，提出了“治安强化运动”的方针，取消了“剿共灭党”的口号，而专致力于“剿共”……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，不仅自己伤亡很大，元气不易恢复，且增加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，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。邓小平同志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，他进行了客观而中肯的分析，既看到了百团大战在当时的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，又指出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产生的后果。这对于我们是很好的教育。

第三节　粉碎日寇“囚笼”政策

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。在平型关大捷之后，党中央再三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一基本战略方针，要开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。要分散兵力，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，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仗为主。整个华北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，以备在敌人占领整个华北后，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。根据党中央的部署，11 月 8 日太原失守后，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对日正规战争已告结束，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主导地位。在新的形势下，华北我军分为四大块，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：115 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，开辟晋西地区；120 师开辟晋西北地区；129 师开辟晋东南地区；115 师一部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地区。1938 年以后又陆续创建了冀中、冀南、冀东、冀豫、鲁西、山东、冀

鲁边、晋绥等抗日根据地。至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时，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，部队由不足 3 万人发展到 15.6 万人（其中 129 师由一个半旅发展为十一个旅）。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敌后创建了苏南、皖南、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，部队发展到 2.5 万人。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了日军 40 万人，伪军 7.8 万人，有力地打击和迟滞了日军的进攻。与此同时，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对日作战，坚持了抗战阵地。

1938 年 10 月，日军侵占广州、武汉后，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。由于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强大，对日本侵略军构成了致命威胁。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、军事打击为辅政策的同时，加紧了对八路军、新四军的进攻，而且动用兵力规模越来越大、次数越来越频繁，手段也越来越毒辣，不断改变战术。由开始拉网式的扫荡，发展为分进合击、长途奔袭、铁壁合围、抉剔清剿、梳篦战法、堡垒政策、步步蚕食，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和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相结合的“总力战”。其滔天罪行，令人发指，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，难以计数。特别是 1941—1942 年，我根据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时期，根据地面积减少 1/2，人口减少 5000 多万，总兵力由 50 万人减少到 40 万人。在两年中日伪军对我各根据地进行了千人至万人的“扫荡”132 次，1—7 万人兵力的大“扫荡”27 次。尤其是对晋东南“扫荡”更为残酷，因为我八路军总部和党政领导机关集中于太行山区，成为日寇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发誓不加消灭誓不罢休。

日寇对我各根据地实行了残暴的“囚笼政策”。所谓“囚笼”政策就是“以铁路为柱子，公路为链子，据点为锁子，挖成封锁沟，修筑封锁墙，将根据地切割成各个小块，实行网状压缩包围，使我军无存身之地，妄图把我军困死、饿死。”我们晋冀鲁豫边区东有津浦铁路，西有同浦铁路，南有陇海铁路，北有正太铁路，平汉铁路又直插其中，构成了大大小小的“囚笼”。1942 年，在日本侵略军加紧“扫荡”、“蚕食”和“治安强化运动”、“总力战”全面进攻之下，各个

根据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。我晋冀鲁豫边区，敌人所到之处，制造了许多无人区，房屋被烧只剩一些残垣断壁，村庄被抢掠一空，粮食全都抢走、青壮年被抓走 42 万人，加上又发生了罕见的大旱和蝗灾，真是天灾人祸、祸不单行。许多地方土地荒芜，经济困难，生产大幅度下降。部队更是食粮不足，油盐菜蔬缺乏，不得不以黑豆、麦麸、野菜、树叶充饥，造成病员增多、战斗力削弱。

这一时期，党中央对敌后抗战连续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。中央指出，目前形势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，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更加剧烈，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“坚持长期斗争，保存自己实力，准备将来反攻”。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，恢复元气，坚决实行精兵简政，节省民力，休整兵力，训练干部和发展经济，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。中央号召我们要咬紧牙关，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阶段。实践证明中央的指示非常英明，完全正确。

邓小平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了既能支持长期抗战，又利于准备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。中共中央指出“：我党政军均应了解，假若民力很快消耗，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。”邓小平指出“：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，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精兵简政，减少脱离生产人员；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，反对贪污浪费，自己解决部分经费。’他亲自抓 129 师师部的精简，师直属单位从 41 个减少到 19 个，各军分区和旅共减少 156 个伙食单位，减缩了机关，充实了战斗连队，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和各级武委会，加强了民兵工作。使全太行地区党政军群脱离生产人员压缩到占总人口的 3％以下。

与精简同时，实行了严格的节约措施。部队的小米供应，主力部队由每人每天 1 斤半（16 两为 1 斤）减为 1 斤，地方武装由 1 斤减为 15 两，机关人员由 1 斤减为 13 两。粮食不够吃，只能采集野菜、树叶补充，整天吃拌菜的‘和子饭”。在这种半饥饿的情况下，大家严守群众纪律，老百姓满山红彤彤的柿子，没有人去摘一个。还要在定量内千方百计再节约粮食去救济灾民（当时急待救济的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民达 35 万人，占当时全区人口的 23% ,还有从国民党统治区逃来的灾民 7 万多人），有不少奄奄一息的灾民就是吃了救济粮才得以活命。部队 1943 年的冬装到入冬之后才筹措到土布和棉花，没有染料就用草木灰染色，动员人人动手、自做自穿。刘邓首长吃饭穿衣都和大家一样，没有任何特殊。

根本出路是发展生产。邓小平同志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：“必须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，今后应把生产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,要特别加强农业生产,同时抓好手工业生产”。为扶植人民群众生产，边区政府除减免灾区负担外，还从西部调运粮食低价卖给农民 21 万石,以工代赈 1.5 万石,农业贷款、水利贷款、手工业贷款共计 6000 万元。党政机关和部队一方面帮助群众生产，一方面自己开荒种地 10.1 万亩，各单位的经费和吃菜全部自给，粮食自给 1—3 个月,减轻了人民负担,改善了部队生活。

我们是在敌人重重包围、封锁下生产救灾，必须一面对敌人作战,一面坚持生产,实行劳武结合。邓小平同志指示：“敌后经济战线，包含了两个不可分离的环节，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，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。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；没有根据地建设,更谈不上对敌斗争”。要‘减轻人民对敌负担,即打击敌寇对敌占区、游击区、边沿区的掠夺和对根据地的摧残，必须军民结合,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,减少损失至最低限度。’日寇推行的第五次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重点是经济掠夺，粮食成为敌我斗争的焦点。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 1942 年 10 月 23 日的联合命令中明确指出：“在继续开展政治攻势中,加强保卫秋收战的组织与指挥,以积极进攻的手段，打击与破坏敌人在敌占区、接敌区抢粮，在抗战区毁粮的意图，成为我目前准备反‘扫荡’战及粮食争夺战的中心任务。”命令下达后，各部队带领民兵展开了以粮食斗争为中心的军事、政治攻势,痛击抢粮之敌,拔除敌守备薄弱的据点,镇压汉奸特务，粉碎敌抢粮计划。385 旅 769 团在保卫秋收中作战 45 次,掩护屯粮 88 次，夺回被敌伪抢走的粮食 26800 石。

向‘敌后之敌后’挺进,是在同敌人进行反‘扫荡’、反‘封锁’、“蚕食”、反‘囚笼’斗争中的创举。我军本来就处于敌后,到‘敌后之敌后”是指到边区抗日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，也就是“敌进我进”,敌人到我根据地实行‘囚笼’政策,吞食封锁,我们就钻到敌人占领区去活动。敌人兵力不足、分散配置,实际上是‘前紧后松、前强后弱”，敌占区空隙很大，民族战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，政治上敌人孤立。但是向敌后进军不能大部队，只能是敌后武工队,既是战斗队,又是工作队,还是宣传队,人数不多、短小精干。要到敌后去，首先要越过由封锁沟、封锁墙形成的封锁线。封锁沟一般深 5—6 公尺,宽 5—6 公尺 封锁墙高 8—10 公尺，间隔有据点、碉堡，由日伪军把守，一有情况就发警报，用火力封锁或出来袭击。但是由于事先周密准备，同时依靠群众带路，就使敌人变成了聋子、瞎子，封锁线阻挡不住我小部队的活动。

在敌占区大力进行伪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工作，是我军得以立足、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。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,通过散发宣传品、碉堡喊话、召开伪军政人员家属座谈会、释放俘虏,瓦解伪军,建立内线关系,将公开斗争与荫蔽斗争相结合 变一面事敌的伪政权为两面应对的两面政权，实行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坚决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 黑红分明,将功折罪,政策兑现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，取得了日寇严密封锁的药品和电讯器材，使我军武工队的活动由堡垒户发展到堡垒村、堡垒区，开创了“敌后之敌后”抗日斗争的新局面！

在千难万险中，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在党中央和刘、邓首长的领导下,团结一致,艰苦奋斗,终于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‘扫荡’、“围攻”、“蚕食”、“清剿”、‘囚笼’政策名存实亡,战胜了凶恶的敌人，战胜了严重灾害，不断取得了新的胜利。这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党中央决策的英明，领导的正确，刘邓首长以身作则，和军民同甘共苦,凡是号召大家做的,他们首先身体力行 凡是不准许办的,他们带头不办。所以全党全军有令则行，有禁则止。不论对敌斗争多

么残酷,物质生活多么困难,大家始终心情舒畅,团结一致,斗志昂扬,克服困难,英勇奋战,努力做好各项工作,去争取新的胜利!

第四节　雄伟太行　愚公移山

抗日战争期间,《在太行山上》这首震撼人心的革命歌曲广为流传。这首歌的歌词是:

“红日照遍了东方,
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。
看吧!千山万壑铜壁铁墙,
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,
气焰千万丈!
听吧!母亲叫儿打东洋,
妻子送郎上战场!
我们在太行山上,
我们在太行山上,
山高林又密,兵强马又壮,
敌人从哪里进攻,我们就叫它在哪里灭亡,
敌人从哪里进攻,我们就叫它在哪里灭亡!”

这首歌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写照,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,充分表达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雄气概。

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不仅是四战之地——晋冀鲁豫四省在华北的特殊重要的战略要地,而且由于太行山是华北抗日战争的领导中枢——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,许多重要决策和指示从这里发出,许多宝贵经验由这里传播,这里是我们的希望,也是我们胜利的旗帜。邓小平同志 1938 年初率部到达太行山区,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创建,卓越地进行了建党、建军、建政和群众工作,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。1942 年 9 月他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,领导太行、冀南、太岳、晋豫四

个区党委。1943 年 10 月他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，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。

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，大多是以交通线为中心的对敌伪军作战。1937 年 12 月 22 日至 26 日粉碎日军由正太铁路出动的六路围攻，此役毙伤敌 700 余人，为建立晋冀豫边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。1938 年 4 月，粉碎了日军 3 万余人的九路围攻，歼敌 4000 余人，收复县城 18 座，光复了长治地区，伸向道清路（即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清化镇的铁路线）活动，扩大了我军的影响，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。当 1938 年 4 月至 5 月徐州会战、6 月至 10 月武汉会战之际，我军组织了对平汉线和津浦线的破击作战，尤其是对平汉线的 10 多次大破击，给予正面的国民党军队以很大支援。1940 年则由我军主动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交通线的斗争，以打击敌人的“囚笼”政策，其最大者为冀南全年的破击交通线斗争，5 月白晋（即白圭至晋城）战役，破坏铁路 50 余公里，摧毁大小桥梁 50 余座，歼敌 350 余名，打破了敌人的修路计划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图。特别是由 8 月 20 日开始直至年底的百团大战，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、昆明、西安的计划。1941 年—1942 年晋冀豫边区进行了 19 次大的反“扫荡”作战和 515 次反小“扫荡”与袭扰，两年作战达 7976 次。1941 年之后，加强了军区和县区基干武装、民兵建设，不少正规兵团地方化。1942 年成立了上百个敌后武工队，认真地注意了面向敌占区、面向交通线，加强“格子网”内的斗争，根据地巩固发展。我军由初创太行抗日根据地时的 3 个团，发展壮大为近 40 个主力团，115 个县基干武装都普遍建立。邓小平同志始终注意加强部队的军事、政治、技术、文化、纪律建设，这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，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。综观晋冀鲁豫对日作战的特点，这就是敌我双方争夺交通线的斗争。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把交通线的保障视为生命线，其部队调动、武器弹药供应、粮秣被服药品补给、伤员运送等等无一不是靠交通线的安全畅通来实现，所以千方百计保障交通特别是铁路的安全，扫除对铁路交

通的威胁。而我军要粉碎敌人的战略企图作战计划，打破其“囚笼政策”，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，就要卡断敌人的生命线，敌修我破，反复争夺，这就是现代化战争的要领。

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始终注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。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我八路军进入太行、太岳、冀南、冀鲁豫四个地区，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，建立起各级政权，建立起工农青妇文各群众组织，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，形成的根据地。邓小平同志指出，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。在没有党的地方，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。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，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，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、政权、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，党的领导发生错误，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、巩固与坚持。他一直重视党的思想、组织、作风建设，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战斗力。他坚决纠正了 1940 年讨逆战争（即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、鹿钟麟、朱怀冰对冀南、太行、鲁西各根据地的进攻）和 1939 年 12 月反击山西军阀阎锡山发动的多次反共事件中政策上“左”的错误。特别是 1943 年 4 月开始，他领导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。他在 1943 年 11 月 10 日的重要讲话中，称颂毛泽东同志的领导，阐述毛泽东思想。邓小平说：“遵义会议之后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，彻底克服了党内‘左’右倾机会主义，一扫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，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，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，……的确，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，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，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几年是很幸福的。”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，有了这样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，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”。亲身经历过党内‘左’倾路线错误，遭受严重打击的邓小平，从实际对比中，对毛泽东作了高度评价，明确指出中共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，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首次，当时对我们印象很深。在 40 年后，遭受‘文化大革命’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后复出的邓小平，在 1977 年 7 月 21 日发表了《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

思想》的讲话;1980 年 3 月—1981 年 6 月期间,对起草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的意见,所作的 9 次讲话;1980 年 8 月 21 日、23 日,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·法拉奇问,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。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崇高品德,坚持党性原则,采取严肃科学的求实态度,不计个人荣辱沉浮,准确论断,是非功过分明,强调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,这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有巨大的意义,在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。

在领导整风运动中,他还及时纠正了审干工作中“左”的错误。在审干运动中,由于受到康生在延安掀起的“抢救失足者”运动中大搞“逼供信”错误作法的影响,我们晋冀鲁豫边区一些地区机关、党校的审干中搞‘坦白运动’,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着‘逼供信’的错误。邓小平同志和北方局多次召开集有关领导开会,分析讨论审干中的问题,下决心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的精神,坚决纠正‘逼供信’的错误。到 1945 年春,历时 2 年之久的整风运动胜利结束,统一了党的思想,提高了认识,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进行,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组织上、军事上、物质上都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加强,为迎接对日反攻的胜利作了充分准备。

晋冀鲁豫边区的政权建设,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领导下进行的。1940 年 4 月,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、太岳、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,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就建党、建军、建政三大任务做了重要的讲话,首次提出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的主张。会议决定成立冀南、太行、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(简称冀太联办),向建立边区政府过渡。8 月 1 日冀太联办正式成立,杨秀峰为主任,薄一波、戎子和为副主任,划分了冀南、太行、太岳三个行政区,下辖 15 个专区、115 个县。1941 年 4 月开始,太行根据地开展了公民登记、民主选举村政委员会和村长。进行了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,7 月 7 日,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开幕,133 名参议员参加了会议,选举八路军代表申伯纯为议长,无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